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六十期（总第 310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8 年 12 月下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要目

●本期专题/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

中国奇迹的源头与动力何在

中国改革 30 年十大人物

三十年中国人收入流变

双重考验下主要经济指标呈现下滑态势

告别 2008

●刊首语：春天就在不远处

告别 2008，我们感觉，这个冬天有点冷。“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温家宝总理 3 月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言犹在耳。2008 年让所有人回味，因为经济走势和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密切了。从来没有那个年份，让我们同这个世界贴得那么近，从 5 月的汶川大地震，从 8 月的第 29 届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从 10 月的华尔街汹涌而来的金融风暴……

2008 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外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内部面临经济周期性回调，中国经济经受双重考验。连续多年保持的高速增长势头开始放缓，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少见的下滑态势。但在年末时，有一种声音响遏行云，那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我们记住了这样几句：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 100 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从“双百”到“三不”，胡总书记描绘的远景壮丽，同时他又头脑冷静。他意在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实现“双百”，先要“三不”，因为我们从建立新中国到今天，有过辉煌的成就，也有过惨痛的教训。对于改革开放，我们曾经争论过，动摇过；对于征程的漫长和艰难，我们曾经懈怠过；对于怎样干好社会主义，我们上上下下都曾经折腾过，建国后，我们曾经错失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黄金期。

2008 年远去了，全球经济危机寒未了，面对考验，我们在经过初期的迷茫后终于达成共识：国际金融危机不会逆转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而且危机客观上为我们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加快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倒逼机制。”信心比黄金更珍贵。陆续出台的救市政策已透出复苏的春意，我们的企业和老百姓也对中国经济满怀期待，共同期待市场转机，在寒冬中迎接春天的到来……

盐城人当然要把盐城的事办好。“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把盐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努力建设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新盐城、城乡协调互动发展的新盐城、人民群众生活富裕的新盐城、全民素质明显提高的新盐城、和谐安定的新盐城、生态文明的新盐城。”2008 年 12 月 24 日，在盐城市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大会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鹏提出要打造六“新”盐城，把盐城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好一个六“新”盐城，让人耳目一新！

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市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审时度势，积极应对，攻坚克难，一着不让，全市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预计 2008 年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600 亿元，比去年增长 13.6%；财政总收入突破 200 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90 亿元，增长 3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120 亿元，增长 35.6%；注册外资实际到账 10 亿美元，增长 23.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680 元，增长 13.2%；农民人均纯收入 6790 元，增长 11.5%。这是 12 月 29 日召开的市委五届五次全会上传出的令人振奋的消息。

从 1978 到 2008，弹指一挥间。30 年来，盐城人和全国人民一起，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经受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走过了艰辛探索的 30 年、成就辉煌的 30 年！在这片充满希望的

土地上，盐城人用心血、汗水和智慧，谱写了气势磅礴、绚丽多彩的恢宏篇章。

100年后，中国会怎样？盐城会怎样？30年后，中国会怎样？盐城会怎样？让浪漫人的诗人去想象吧！这个冬天有点冷，但我们会说，春天就在不远处！

在年终之际，本刊推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刊，以志纪念过去的三十年，以志纪念这个光彩夺目而又风云激荡的2008年。

●本期专题/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中国奇迹的源头与动力何在？

1988年秋，在改革10年之际，我们写过一篇长文。文章开头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点现在恐怕很少有人怀疑了。8亿农民开始卷入商品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迁，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0年以年平均9.3%速度的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较早地陷入了举步为艰的困境。‘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逐渐被‘摸着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的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文章的末尾，我们总结10年改革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未走到尽头，中国的文化并未预先注定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转变中将再次磨难，中国人只要克服焦躁情绪，选择正确的战略转折，是可以避免动乱或停滞的前景，而争取腾飞的前途。

30年的最大成就

后来的发展表明，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一个路径，从1989年起，中国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稍稍的停滞和迟疑，然后迅速走上了腾飞的大道。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国内外的观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GDP2360美元这个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入门的门槛。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而并不是只惠及少数人。迄今为止，中国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

的停滞陷井或在经济增长期所出现的那种社会两极化的大规模对抗和动荡。亿万中国农民，在继续保有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权的同时，通过进城打工，普遍显著改善了收入和生活水平。无论农村本身还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体上围绕 0.35 的水平在波动，仍然属于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差距。

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这样的经济奇迹？人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说法是说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从而搞对了激励。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的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说，在东亚模式里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除了规模大，中国也无特别。但大国外向型经济成功，本身就是奇迹。同时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未加证明的判断：中国延续了 30 年的高速增长也会马上结束，因为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最长也只有 20—30 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显然面临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耗尽，中国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四大原因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中国在过去 30 年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大体上有以下四方面：

一、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

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推动作用并不下于改革，这是很多人的感慨和共识。从文革后中国的极度封闭和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起步，中国人实行了坚决而又有步骤的对外开放。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对外依存度，从只占 GDP 的 10% 以下，到 65% 以上，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管理制度与经验乃至各种信息的全面涌入，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催化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因此，说中国 30 年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利用了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肯定没有什么错。同时应当看到，从文革后的统治经济和思想禁锢，只经过短短的 30 年，中国就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惊人差距，没有导致自身的迷失、瘫痪、分裂或解体，而是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交流和对话的能力，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和无保留的开放能够做到的。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机制设计。一个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

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二、坚定然而又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取消或废止计划体制，而是承认计划经济的现实和存在合理性，采用了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途径，逐步发展市场经济和转化计划体制，因而避免了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断、混乱和经济滑坡，保持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增长趋势。市场经济激发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去满足任何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社会需求的动力，从而迅速带来了供给充裕、经济繁荣和社会富硕。中国的私有产权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个体户经济、家庭私有财产的发展、扩大和普遍化、承包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资本经济的渐次发展阶段，使得社会有一个认识、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始终保持了混合经济的形态，就是市场领域和政府干预和调控的领域并存，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并存，从而保证了宏观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中国一方面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又保证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通过废除官员的终身制和世袭倾向以及持续不懈地反腐败努力，比较成功地扼制了中上层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大规模转化为私人或家族资本的企图，使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落入家族寡头的手中，避免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家族化或官商勾结的演变，而这在一个血缘关系传统深厚、法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本来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最容易出现，从而导致社会对抗和动荡、经济增长中断的陷阱。

三、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这就是实行了最严格的人口迁移管理和城乡户籍管治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不是去取消或直接冲击这种二元经济体制，而是在农村保存原来集体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迅速地解决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问题，大大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普遍福利水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更大意义是它解放了原先被计划体制和集体生产方式所禁锢的农村劳动人口，从而诱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

首先，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农民迅速从边际投入接近于零的单纯粮食生产向边际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农副产业转移投入，接着是创办乡镇企业，向离土不离乡的非

农产业转移，再后是出现了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农民工劳动大军。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既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原本僵化的国营企业的用工制度，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工业和城市中的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和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制提供的务工农民在家乡有一小块均分地的安全保障相配合，极大的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政府垄断征地使城郊土地改变用途的级差地租主要落到了城市政府手中，这样就为城市的迅速扩张和升级提供了财政来源。显然，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作为最终保障的均分承包土地，垄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低价征地，是中国经济 30 年高速增长最重要源泉的之一。

四、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

中国作为一个幅源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史以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权力划分上也是多次拉锯和反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从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一个大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是从 1980 年起，就“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其间几经变动，包括 1994 年在按照 1993 年中央和地方分成基数的基础上，实行不同比例的分税制，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分成规则的透明性和稳定性，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分灶吃饭则是改革以来一以贯之的大格局。

由于中央政府垄断了货币证券发行权和政府发债权，在中央给定的规则之下和之外，千方百计地组织地方政府掌握的其它全部可能的资源和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谋求发展的唯一途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个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地方有限责任公司，统筹调动和配置地方各种资源，包括与上级政府及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垂直资源。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流入的外部条件，使用更有吸引力的财政税收返还和土地优惠，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这样，在私人资本和外部资本以及劳动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竞争。中央政府对统一市场的维护和对地方封锁的抑制，以及地方政府对外来资本的渴望，以及地方市、县一级政府的国企已经很少且一般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大大削弱了地方竞争中的地方垄断和地方保护。地方所有制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人资本发育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它在丧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时，又以规模经济和公平效应进行了补偿。从而使中央集权、统一市场下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既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别人现有模式的

结果，也不是其他人能够拷贝复制的普遍模式。（作者：华生、罗小朋、张学军、边勇壮英国《金融时报》。华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他们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中国改革 30 年十大人物

1、邓小平 中国经济改革领导者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开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纪。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他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作为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提议者，他的政策几乎影响到了 20 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曾八次被选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他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让整个中国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2、杜润生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杜润生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20 世纪 80 年代，他在指定中国农村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其著名的“一号文件”中主张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所有权交还给农民。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杜润生在上世纪数十年的工作中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李嘉诚 香港商人和全球最富有的华人

因精明的商业头脑而在香港被称作“超人”，他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他从贫困到富有的传奇鼓舞了很多人—15 岁时他在一家塑料贸易公司当普通工人，但现在他在世界富豪排名榜上位列第 11 位。他是长江集团的董事长，他所拥有的公司总市值达到了三千亿港元。虽然他有着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也因节俭的生活方式和巨额的慈善捐款而闻名。

4、柳传志 联想集团创始人

柳传志有雄心、能力和奉献精神，他的职业生涯标志着开创和创新，他是中国企业界的教父人物。柳传志与 10 名志同道合的同事以 30 万元人民币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也就是联想企业的前身。经过 20 年的时间，联想已经同一家国有的小公司，变成世界排名前十、中国领先的高科技公司。而所有这些成就的缔造者在 40 岁时才进入商界。成功并购 IBMPC 业务部，名列世界 500 强。他的信念就是知识创造财富。

5、吴敬琏 经济学家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他最早提出市场取向改革论，他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他正确地提出 1984-1989 年间的反通胀主张。2006 年他指出中国经济和企业还处在“少年时期”，认为中国实现全民低保条件已经成熟。这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泰斗，始终高举理性的旗帜，坚持阐述民本的情怀。尽管他有很多称号，但最说明问题的是媒体亲切地称他为“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市场改革的先驱。

6、小岗村十八户居民和集体所有制的结束

1978 年，中国农村仍然实施着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体制，但安徽的一个小村庄尝试了不同的道路。小岗村的十八户人家在一份合同上签了名，摺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农民自己而不是国家对盈利或亏损负责。这一事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验地，安徽凤阳小岗村，自下而上，让中国的农村从此不同。

7、袁庚 蛇口工业区创建者

袁庚，让已经打了百年的香港招商局的招聘，转变成一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用工具。这位穿越了中国近代史的老人，创造改革重要的试管，创办了深圳特区蛇口工业区。中国看深圳，深圳看蛇口。他在许多行业都是领导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并先后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倡导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由企业合股兴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同时还成为第一家进入国际保险市场的中国企业。

8、袁隆平 杂交水稻之父

中国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杂交水稻的培育。他的成功在一些数字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的杂交水稻新品种使中国每年可以多养活六千多万人，水稻十年间增产 1 千亿公斤。

9、张瑞敏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

张瑞敏热衷于运用新的想法，采用西方的商业做法和技术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2007 年，海尔的全球营业额达到 11.8 亿元，而 1984 年张瑞敏开始掌管海尔时，海尔还是一家背负着 100 多万元债务的国营工厂。张瑞敏举起了中国现代企业质量管理具有启蒙意义的大锤。他下令工厂的工人们把大量的不合格的冰箱砸成碎片。质量管理从这一刻起被引入中国，随即出现了“客户永远正确”的市场观念。

10、朱镕基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湖南人因铮铮风骨而闻名，朱镕基也不例外。他敢于碰触国企改革、机构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雷区。1998-2003 年，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在其任期内，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失业与通胀风险。他雷厉风行，至钢至烈却又情系百姓，致柔致真。他是一名改革家。(英国《金融时报》，排名按姓名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排)

三十年中国人收入流变

过去的三十年里，城镇居民的收入基数要比农村居民高，而且增速也快。中国人每创造100元的财富，个人能拿到的只有45.4元，23.1元流入国家财政，31.5元变成资本和存货。

三十年来人均收入的增幅在逐渐递减。

GDP的增长速度高过人均收入的增幅，导致内需不足。GDP增速远超收入增速。考察一个国家和社会之进步，也许我们只需要两个指标就够用了：其一为“效率”，其一为“分配”。

为了具体化这两个抽象的概念，经济学家引进了两个统计口径：“GDP”和“人均收入”。前者用于描述一个国家和地区年度经济活动的总量；后者用于描述人们从他们的经济活动中获得了哪些收益。作为考察指标，前者可以粗略考察该国的经济现状，后者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该国长久发展的后劲。

1978年，中国的GDP为3645.2亿元，2007年为246619亿元，增长了67.6倍，剔除物价因素，大致增长了15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为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为4140元，增幅分别为大致40倍和30倍，剔除物价因素，一个增长了大约9倍，一个增长了不到7倍。

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一、中国GDP的增长速度高过人们收入的增幅；二、城镇居民的收入基数要比农村居民高，而且增速也快。

今天，最让我们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内需不足”，这个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的生产能力超出了我们的消费能力。对于一个穷国来说，中国的潜在需求应该远超过生产能力才是正常的，为什么竟然会出现所谓“内需不足”呢？对这个问题最直观的一个解释就是：中国GDP的增速高过人们收入的增幅。

回过头来看，沿用“效率”和“分配”这两个考察指标，我们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作为世界模范生，我们在“效率之递进”这一问题上无出其右；在分配的问题上，虽然人们的收入也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不过，却没有充分分享经济效率之提升（考虑到GDP之增速大致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2倍，这一问题不容忽视）。时至2008年，我们猛然发现，在分配问题上的这一容易被忽视的现象竟然反过来成为我们经济进一步发展、效率进一步提高的最大障碍：内需不足。

那么，超过人们收入的那部分财富跑到哪里去了呢？

大致说来，人们创造的财富会被三部分分享：劳动者拿走工资，国家拿走税收，资本拿走利润。其中个人工资会被统计入“收入”，资本利润中的分配给股东的部分也会被统计入“收入”，剩余部分就是税收以及资本利润中不分配的部分。当然，从理论上讲，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只是把一部分人的收入转换为另外一些人的收入。不过，在实际操作上，财政支出多用于公共服务，而这些服务很难计入服务对象的个人收入中去。故此，我们粗略地把税收与个人收入并列。

这样分析下来，超过人们收入的那部分财富，一些跑到了国家手中（大部分变成了公共服务），一些跑到了资本家手中，变成了资本和存货。

2007年，中国不含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税收总额为4.9449万亿元，再加上7584.6亿元的关税，国家拿走的那一块大致为5.7万亿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拿走的收入（包括工资、利息、股息等其他收入）总额为11.2万亿元（城镇居民总人口5.94亿，人均收入近1.4万元；农村人口7.3亿，人均收入4140元）；在总额24.66万亿元的GDP中，除去以上两块，剩下的就应该是资本和存货，其值为7.76万亿元。这里应该包括贸易顺差，去年的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8万亿元。

城市化的裨益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中国人每创造100元的财富，个人能拿到的只有45.4元，23.1元流入国家财政，31.5元变成资本和存货（其中7元流出国外，变成中国的资本输出）。

1978年，以上数字分别为45、31和24。

1988年，以上数字分别为47、17和36。

1998年，以上数据分别为49、12和39。

粗略地看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收入占GDP的比例大致在45%至50%之间，呈先低后高，再又变低的趋势。

可是，既然GDP的增速分别高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为什么国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迄今为止还能基本保持稳定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城市化。

虽然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幅都低于GDP增幅，可是一方面，总人口增加了，一方面，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居民变成城镇居民，这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增幅超过了GDP的增幅。于是，总体上就表现为人们收入占GDP的比例大体不变。

1978年，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82%；1988年为75%；1998年为67%；2007年

为 55%。平均每年大致下降一个百分点，且呈加速度下降状态。数亿中国人从农村来到城镇，使得城镇居民总收入占全国居民总收入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35% 上升到 2007 年的 79.1%，这维持了收入占 GDP 之比大致稳定。

那么，为什么在人们收入总额占 GDP 的比例大致不变的情况下，以前没有出现的“内需不足”突然出现了呢？

原因在于资本积累。1978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356 亿元，2007 年，这一数字为 13.7 万亿元，增长了 385 倍，而同期的 GDP 增速为 67.6 倍。持续高速增长的资本积累，产生了大量的产能，这些产能最终超过了人们的有效需求，于是产生基于产能过剩的“内需不足”。

而持续高速增长的资本积累是由中国人的高储蓄率支撑的。1978 年，居民存款余额为 210.6 亿元，当年的居民收入总额为 1647 亿元（农村居民主要是实物收入），存款余额与收入之比为 12.75%；1988 年，这一比值为 53.5%；1998 年，该比值上升为 131.5%；2007 年的比值为 157.1%。

到今天，中国罕见地又是穷国，又是资本净输出国，正是缘于长期的高积累。（一般说来，穷国应是资本净输入国家，因为穷国人们的需求更旺盛，需要更多的投资；穷国的就业问题更严重，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人均收入增幅逐渐递减。

前面我们提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城镇居民的收入基数要比农村居民高，而且增速也快。细究起来，城镇居民收入的基数始终高过农村居民，不过，在论起增速就未必了。

在整个 1980 年代，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超过城镇居民。不考虑物价因素，1990 年，农村居民收入是 1978 年的 516%，同期城镇居民的收入之比为 440%。步入 1990 年代之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速开始落后于城镇居民。2000 年，农村居民收入是 1990 年的 328%，城镇居民则是 415%；2006 年与 2000 年相比，农村居民为 159%，城镇居民为 187%。

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居民更容易分享到改革初期的成果。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前的农村处于赤贫状态，过低的基数使得增长幅度容易大。（1978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33 元，主要是粮食等实物收入折算下来的，即使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也仅够果腹而已。）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均收入的增幅在逐渐递减。即使剔除物价因素，这个结论也基本成立。在最近的十年，这个现象尤为突出。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 1980 年代，改革会受到全社会的广泛支持。而今天，在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今天，一些社会矛盾反而显得较 1980 年代更为突出。

我们回顾过去三十年，不是为了做单纯的分析，而是希望对未来会有帮助。从收入角度，以下几个结论也许值得今后更多的关注：

第一，国民若不能充分分享经济活动之增长，这一方面可能会加深社会冲突；另一方面，会影响总需求，进而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

第二，税赋过高，非国之福。此外，税收本身应纳入国民监督之中，否则容易形成国民财富之净损失。

第三，在分配上过多地向资本倾斜，恐亦非国家社会之福。（《南方周末》陈涛）

双重考验下主要经济指标呈现下滑态势

200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温家宝总理3月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言犹在耳。今天人们再次重温此话，感受更深：一年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发达经济体的全面衰退，我国经济也在出口受阻、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调整等多重因素作用下，面临着严峻考验。

2008年让所有人回味，因为经济走势和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密切了：次贷危机的风波、A股市场的下挫、救市与大小非的困惑……从宏观经济政策保增长的抉择到两调印花税下的井喷行情，从机构投资者的举动到草根股民的经历，全部成为曲折中成长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最佳缩影。

站在2008年末回望，全球经济危机仍余寒未了，面对考验，我国经济界在经过初期的迷茫后基本达成共识：国际金融危机不会逆转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而且危机客观上为我们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加快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倒逼机制。”陆续出台的救市政策已透出复苏的春意，我们的企业和老百姓也对中国经济满怀期待，共同期待市场转机，在寒冬中迎接春天到来……

外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

内部：面临经济周期性回调

中国经济经受双重考验

200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连续多年保持的高速增长势头开始放缓，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少见的下滑态势。以11月份为例，当月出口额约为1150亿美元，同比下降2.2%。这是自2001年6月以来首次较上年同期下降。进口更是同比猛降17.9%至749亿美元。

与此同时，作为最能反映企业运行的指标，11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为5.4%，增速创下1994年以来的最低同比增幅；PPI同比上涨2.0%，增速回落幅度远超预期，创下31个月新低。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是中国经济此轮调整的两大因素。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金融危机冲击外贸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加深，特别是最近两个月，进出口、工业生产等受到很大冲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一方面，这一轮经济周期性回调也有内在的需求，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经济周期的波动使它进入了回调期。此前，中国经济已连续6年保持高增长，世界罕见。正是周期性下行和国际金融危机两个力量的叠加导致此轮回调。

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表示，中国经济此轮调整，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外，中国经济运行本身也到了一个拐点，即使没有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也不可能一直在高位运行。多年以来积压下来的经济结构失调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也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是短期的，怎样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长期且更为迫切的任务。”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说。当前，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赖以保持高速增长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被削弱。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应对挑战，政策演绎三重变奏曲。

从年初的“双防”到下半年的“一保一控”，再到经济工作会议将目标进一步调整为“保增长”，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一波三折，经济政策也经历了三重变奏曲，以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和内在调整的压力。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策基调的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发生转向。步入下半年，央行频繁使用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央票发行明显减少，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转而进入下降通道。与此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走上前台，在保增长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今年的经济发展，前高后低、由升转降，外部因素的变化远远超出预料。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积极灵活的调整，反应非常快，力度非常大，历史少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

面对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央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张立群认为，当前中

国经济仍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动力和市场空间，只要迅速贯彻落实这些政策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完全能够实现。

厉以宁认为，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金融业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问题主要出在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型的实体经济上，而国家已经出台了很政策，很快就会见效。

老百姓眼中，这是财经生活成长年。

在一些中国老百姓的眼中，如果说 2007 年是财经生活的“入门年”，2008 年就是财经生活的“成长年”。牛市中尝到甜头的投资者，又在今年承受着资金和心理的双重考验。利率变化、汇率波动、指数跌涨，回顾一年的财经生活，不少百姓讲述了自己的酸甜苦辣。

“去年的主旋律是加息，今年变成了降息，一加一减让我在理财上花了不少心思。”小孙在北京市一家商业银行工作，三年前买房让自己“背”了几十万元的贷款。“对还贷的人来说降息肯定是好事，但对市场的影响挺复杂，怎么实现收益最大化还得细琢磨。”

小孙说的“细琢磨”，是指如何把手头有限的资金合理安排，“2007 年的加息通道中，为了少交利息把年终奖都还了房贷。现在则是降息通道。”由于银行账户、公积金账户都有几万元的积蓄，是提前还贷款还是留下钱做投资，小孙始终犹豫不定。

而对已经退休的张琦老人来说，光是计算存款一项就要花上不少工夫。“原来加息是忙着去银行转存，现在降息省事了，但存多久还要费心计算一下。”张琦老两口的十几万元存款分别存成了不同的期限，有五年期、两年期和半年期。

张琦告诉记者，短期的存款用于日常开销和买衣服，中期存款用来添置家电，长期存款就是两人多年来基本不动的积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上了年纪也要跟得上时代。”

在摩托罗拉工作的杜尚华告诉记者，儿子很快要去美国读书，本觉得应该留一些美元，但人民币的升值也让自己犹豫不决。杜尚华说，现在降息也难免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手中的美元到底应不应该换成人民币？

杜尚华说，央行自今年 9 月份以来已经连续四次降低存款利率，未来的人民币走势如何，会不会在降息周期中继续波动，很多要出国旅游的百姓也在关心这个话题。

从牛市变熊市，炒股让人心态成熟了。

蔡阳在天津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从 2006 年底开始，他就将股票投资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经过两年的股市跌涨，还是勉强实现了微弱的收益。“今年的股票肯定赔了不少，具体数额也懒得算了，但经过了这样一个大熊市，自己的心态真是成熟了不少。”蔡阳感慨地告诉记者。

蔡阳把 12 月初的一次操作描述为惊心动魄：购买的权证快到期时价格一直走平，考虑到

权证K线的“末日轮”效应，判断主力在吸筹。第二天果然迅速拉高，正激动时权证临时停牌了，一个小时后迅速下跌，根本没有卖出的机会，直跌到接近成本。

“第二天开盘再次拉升时，自己定下了心理价位，在实现了 18%的收益时迅速撤出。”蔡阳告诉记者，这次的操作让自己意识到，散户不应该只想赚钱，更应该明确预期和学会止损。

对刚刚工作的李娟来说，炒股无疑是对心理素质的一次考验，毕竟刚刚赚钱就赔钱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李娟说，对我们这些 80 后的人来说，股市里的摸爬滚打不是坏事，毕竟学了很多东西。

李娟告诉记者，经过一年股市的考验，自己的知识面广了。比如炒股前对期货价格、原油价格等一窍不通，现在由于要分析大盘和板块，肯定要关心这些东西了。

“坚持投资就是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投资还是不投资？“坚持投资就是对中国经济有信心”。郭伟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工作后的五年时间里，已经尝试过股票、基金、外汇、黄金等多种投资方式。

郭伟说，现在的行情太复杂了，美国次贷危机使很多市场出现了反常的表现，说到底，坚持投资就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信心。

而在蔡阳看来，寻找投资品种困难，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缺乏有效的做空机制。看涨的时候可以买入，看跌的时候最多空仓出来，但手里没有股票也是一种风险啊。未来，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可能都是不错的选择。

提前拿到年终奖金的苏博，这次没有把钱花在服装和化妆品上，而是选择了生肖纪念金条和金饰品，“这些东西看起来很贵，但黄金能保值增值，我实际上是把消费和投资结合在了一起。”

“A股市场从 6000 点以上跌到 2000 点，长期看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更大了，成为其股东的成本更低了。”在深圳一家国有发电厂工作的王旭峰说。

王旭峰告诉记者，本来是不想在深圳买房子的，现在听说开发商在金融危机中的日子不好过，国家又出台了多项优惠措施，周末也会出去走走，看看有没有促销的楼盘。王旭峰说，经济走势和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密切了，想不投资也难啊。

企业家眼中，企业重新站在了起跑线上。

2008 年，雪灾、地震、金融危机——几乎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企业所遇到的最为曲折艰巨的困难都在这一年出现。在企业家眼中，这一年并不浪漫，但越是在困难中就越需要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要学会适应，谁先适应谁就有机会。这是一个冬天，但孕育生机，它终

将过去，接下来一个明媚的春天定会到来。同时，企业家们也深刻认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一旦缺失将导致信用危机，同样能击垮一个企业甚至整个行业。

面对金融危机谁先适应谁就有机会

2008年的“冬天”是由一场罕见的冰雪灾害开始的，接下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说，这场危机在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剧烈震荡的同时，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时至今日，这场危机仍在蔓延，尚未看到风暴过后初露的曙光。但是，如果说金融危机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在释放了令人恐慌的灾难后，盒子中一定还保留着希望的种子，那就是比金子还珍贵的勇气和信心！

其实早在今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就在国内率先做出“过冬”的预判。马云在一封题为《冬天的使命》的电子邮件中告诫他的同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有可能进入非常困难时期，“我们准备过冬吧！”马云此言一出，盛夏时节“过冬论”的探讨成为最热的话题。后来事实证明马云是对的，这个冬天不仅仅是阿里巴巴一家企业要面对的冬天。

时隔数月，马云再一次告诫企业家们，“七八月份可以说是危机，现在应该是重建体系”。中国企业的经营发展，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越是在困难中就越需要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要学会适应，优秀的企业家必须学会比别人提前适应这个环境，谁先适应谁就有机会。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认为这是一个孕育生机的冬天，必将迫使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变革中去，除了产品制造，还将向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上下游发展。在中国的技术与资本相对过去已有大幅改善的前提下，全球资源性行业如钢铁、能源成本大幅下降，对中国制造业很有可能“坏事”变“好事”。

新华都实业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唐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只有30年的历程，企业家们大都缺乏大萧条的经验，所以这次用沉痛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将让他们永远铭记：中国企业高负债、低附加值、依赖性的经营模式，应该有一个全面改变，中国企业应该全力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遭遇信任危机社会责任是保发展的基石

企业家们在9月突然遭到了信任危机。“三鹿奶粉事件”把中国乳品行业的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而紧接着导致全行业的信用危机，严重打击了中国消费者的食品消费信心，同时带来的还有对企业家的质疑：你们的社会责任到哪里去了？

唐骏给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现状打了70分(满分100分)，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

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在面对各种社会竞争的同时，还必须正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企业的诚信体系，否则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和诚信制度将无法建立。

复星高科技集团董事长兼CEO郭广昌认为，一个不遵守规范的企业早晚要灭亡，规范必须作为一种价值观为企业所信服，必须铸造成企业的一种生存品格，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保证。一个好的企业一定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虽然也创造了利润，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没有社会提供的广阔的平台，企业不可能获得发展。

张近东则认为，“三鹿奶粉事件”不能无限放大，但这一事件也给企业家们带来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企业必须主动承担起“企业公民”的责任，而企业家也要更多地扮演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承担起对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

回首改革开放 30 年，站在 30 年新的起点上。

2008 年，改革开放 30 周年。汶川大地震的出色应对、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央英明决策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从不同的层面向世界展示了这场改革的巨大成就。所以在企业家眼中，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更是为了从原点重新吹响改革的集结号。

30 年前，34 岁的柳传志还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13 岁的南存辉因为贫穷辍学，在温州走街串巷给人补鞋，张近东那个时候还在读中学。

在不久前《财富》杂志公布的 2008 年度全球企业 500 强排行榜中，联想成为唯一一家跻身全球 500 强的中国内地民营企业，作为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备受瞩目。回首往事，柳传志有很多感慨，其中他最想告诉人们的是要永远记住过去是什么样子，知道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使得改革开放能够坚定地走下去。

荣获“2008 年度最具影响力的 25 位企业领袖奖”的马云说，能否战胜这场金融危机，就成了我们能否开启新的 30 年的关键。

张近东，这个当年亲自站柜台卖空调的汉子，如今已经打造了一个家电零售王国。他说，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未来的中国一定是更加融入世界的中国、更加国际化的中国。

经济学家眼中，中国有能力化解并获更多机会。

在 2008 年的金融海啸中，尽管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经济学家们仍对中国经济保持信心，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不会逆转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中国有能力化危为机。

“中国经济有望率先走出全球经济衰退的泥沼。”这是瑞银证券首席经济专家汪涛最近发布的观点。目前，在全球知名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中，持相似观点的不在少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与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中国 2008 年的条件好得多，体制条件、开放型经济的完善程度已有很大转变。中国现在有 2 万亿美元的

储备，可以更从容地应对金融海啸。

汤敏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不会拖垮中国经济，不会让中国经济步日本后尘在未来经历“失去的 10 年”。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发展的潜力非常大，机会非常多，中国还有一个很长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危机的到来也为正在谋求经济转型的中国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说：“近期经济增长遭遇的一系列困难，意味着过去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说，中国可以利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 2009 年这个困难时期，为自己做好准备，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模式。

经济学家们认为，要化危为机，中国经济结构必须由过去过度依赖外需调整为以内需为主，这一方面需要尽快提高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减少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借机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和转型。

除去危机带来的转型推动力之外，中国的机遇还来自于国际经济格局之变。经济学家们认为，一次大的国际经济危机会导致国际经济秩序和格局的变化，因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新秩序的建立将会为中国提供非常多的机会。（新华社记者 徐岳 魏宗凯 赵晓辉 陶俊洁综合报道 2008 年 12 月 25 日 现代快报）

告别 2008

与人一样,年份也有色彩，也有品格的贵贱。年份，如同戏码，有的苍白枯弱，有的温润华美，有的浑浊，有的澎湃，有的瓦釜雷鸣，有的山高水长。有些年份，只是你数尽三百五十六天,撕下最后一页年历了事。有些年份，每一年，都是一个纪元，留给后人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2008，大概就有这样的品格。

回望 2008，大家看出一个喜忧交集的多事之秋。多事，大体有几层意思：自然灾害如令半个中国交通瘫痪的冻雪，夺走八万性命的汶川大地震；意外事态如拉萨骚乱、奥运火炬接力在欧美受阻，股市狂跌，毒奶粉惊慌，中国经济急速放缓。但对中国人来说，2008 毕竟还有北京奥运的辉煌、中国宇航员的首度太空行走。

今年适逢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 30 周年纪念。其实，2008 对中国真正的指标意义，远远超越上述事件的累积。

第一，30 年走来，中国摆脱“阶级斗争”革命论，不再为意识形态而战，复元“日常生活”，使社会转型成为可能；第二，“自由市场经济”，产权与全球化成为变革中国经济制度的

主调，难以逆转；第三，在中国，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正在重新界定，公民社会的雏形正在发育，民间力量正在成长；第四，中国的外交正在不情愿中逐步走出“韬光养晦”，准备坐上国际大宴的主桌；第五，中国的农民与农村问题，正成为国家决策的实质议题；第六，中国已积累 30 年经验与资本，应是推进政制改革的良机。

30 年，中国走得很不易。我是“60 后”辈份，踩着“文革”的尾巴，步入 1978。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仍是卡其上装的蓝色海洋，但正开始遭遇喇叭裤的偷袭；街头巷尾，“小阿飞”们走私进来的墨镜上，贴着洋文商标。在渐渐褪色的毛主席泽画像前，他们提着三洋牌录音机，流出邓丽君恍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歌声；在革命与凶悍的阶级斗争中，人们已将神经感官磨练得粗壮，突然发现人间还能这样说话、发声与唱歌；许多人先过上“白天老邓（小平），晚上小邓（丽君）”的生活；临晨，新华书店门前，绕街而走的长队，人们正等候抢购狄更斯、莎士比亚、雨果和数理化 XYZ 自学丛书；可爱的洋鬼子，带着他们的蓝眼大鼻子重现天安门；这是中国独有的景象，这是中国人最兴奋、物质与心灵都饥渴地发慌的年代。大学里，各种主义思潮走马灯亮相，如同选美；哲学系研究生常以康德、黑格尔、佛洛伊德为“诱饵”，成为女生大众情人；校园里，同时听贝多芬肖邦、披头士列农、摇滚与台湾校园歌曲，居然没有消化不良；现已渐被忘却的靳羽西，为厌倦了革命的中国女性带回一支口红；国人突然想起还有闲暇与夜生活那回事，啤酒、恋爱与闲暇当然比斗争可爱得多。中国开始喘口气，苏醒过来，换种呼吸与活法，往前走。

回望 30 年，谁影响了中国人的活法？本期《睿》杂志，编辑部同仁评出对中国人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 10 位中外人士，对过来之人是个纪念，年轻人则可分享共和国一个重大时期的集体记忆。其实，30 年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并非仅是 GDP 增长，也不是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答案应当是中国人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也就是活法。近代以来，人们曾反复发出这样一个问题：虽有中华文明、传统、科技为依托，中国为何总是实现不了自己的潜力，建设一个成功的国家？但愿 21 世纪的中国能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全世界的左大脑与右半脑正打架。每个时代，都有独自的烦恼。2008，中国正面临 30 年前绝难想象的问题。谁又能想见西方金融制度竟如此靠不住呢？是全球经济丢失了指南针吗？中国需要时间思考。

不过，在 2008，美国毕竟出了奥巴马。这是划时代的事件，世界变了。不是有句话说，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看好 2008 这壶中国的新酒，现将它裹上红布，将祝愿一起封存起来，日后再喝。（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 2008-12-23）

